

三都水族自治縣志

卷七 教科文志



三都水族自治縣志

卷七 教科文志

(征求意见稿)



教育篇

序

境内教育古已有之。早在东谢部落时期，各洞寨的家庭、氏族内，老一辈人对下一代的教育已具有多方面的形式和内容了。从幼儿呱呱学语到成人男耕女织，以至捕鱼狩猎、格斗射击、吹笙击鼓、歌舞娱乐等生产生活技能，都是在长辈的言传身教和同辈的相互切磋中长进的。这种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至今仍然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代成化年间，始有学校。教育从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发展至今，已有500年历史。本篇仅限于记述学校教育。

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张镇设立烂土司长官学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合江书院停办，这420年间，境内的社学、义学和私塾，见于文献记载的仅30余处。学生除土司、土目和地方官绅的子弟外，只有少数来自小康人家，学校的服务面窄，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封建社会的科名仕宦之材。

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新学”，引进西方近代的部分教材，学生开始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学堂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培育儿童，这是境内教育事业的一次进步。

民国时期，兵燹水旱灾害频繁，^{地方经济停滞，在困境中}地方热心教育人士，亦有捐资，献田、献屋，发展学校教育的事迹，至今尚为人们所称赞。民国11年，有三合私立女校成立，开境内女子教育之先河，之后有恒丰、三洞小学校舍的修筑，有职中大操场和校舍的新建，这些都是地方人士出资出力

的成果，非当时政府的财力所能办到。这一时期，教育发展出现过一次大起大落。民国 31 年，实行“新县制”不久，县政府推行“强迫教育”，到民国 32 年，国民学校从原有 40 余所增到 80 余所，在校生从 4000 余名增至 5000 余名，尽管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占 50% 左右，但当时的师资和财力已无法负担，一些保国民学校虽已建校挂牌，实际难于开课。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政府被迫于民国 37 年下令退却，砍掉 42 所国民学校，学生下降到 3000 余名，实际退到民国 26 年的水平。

解放后，教育为劳动人民开门，民族教育已提到显著地位，境内教育事业进入新时期。37年来，经历两次持续发展和三次波折。

1951年至1957年，教育稳步发展，学校增至 104 所，学生达 12600 余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约占 60%，业余教育也有较大的发展。政府对民族小学特加优待，少数民族学生大增，到 1956 年，已占学生总数的 81%。这所学校风纪、教学质量，都是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为地方培养出一批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1958 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和学生人数都翻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师资、经费短缺，设备难于适应，加以各种运动频繁，课时明显减少，教学质量相对下降。到 1961 年，人民政府进行调整，学校只保留 87 所，学生数降至 6000 余名，经过三年努力，才赶上 1957 年的水平。1966 年秋，“文化大革命”爆发，境内学校从 1967 年到 1969 年，处于停课状态。之后，虽然复课，但原

有的教学秩序已被搞乱，学校风纪、教学质量都远低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这是县内教育史上的一次大波折，几乎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第三次波折出现在1973年至1976年间。这一时期，学校增至500所，学生达41000余名，并把原有的职业学校改为普通中学，使教育结构单一。师资缺乏、经费吃紧、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的局面再度出现。经过将近三年的调整，才趋于正常。

1980年至今，县内教育事业步入第二次持续发展阶段。学校网点趋于合理，区有中学，乡有小学，行政村有初小。恢复新增了一批民族学校的待遇，学生人数稳步恢复到37000余名。小学生人数占学龄儿童总人数的80%。近年来，教育改革已经起步。教师的培训，考核，职称评定，学生的纪律教育等工作有进展，而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已引起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人士的重视。

本篇各章节的记述内容，着重于现代教育的发展状况，对近代和古代的，亦多方搜集资料，加以核实，连络成篇，以保存史料。

编 者

1989年2月

第一章 教育制度

第一节 宗旨、方针

明代成化年间，烂土司长官张镛，深感凭武力难于长期统治各族人民，遂遵照朝廷“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与学校为本”的旨意（见《明史·选举志》），优礼文士，开办学校。其办学宗旨，是钦定“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即忠君、尊孔，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在同一宗旨下，各学校的办学目的有区别。土司长官学，以土司、土目子弟为主要培养对象，造就科名往宦以及书吏、通事等人材，各屯寨的私塾，多属篆学，以培养地方“知书识礼”的初级人材为主。

清初仍沿袭明代教育宗旨。为了从思想上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清政府于顺治九年（1652年）在乡村推广社学，但实际上只办到州县，烂土司辖境未列入办学范围。雍正十年（1732年），都江厅始办义学，乾隆五年（1740年），三脚屯办社学，都属于地方的启蒙学校，并不在官办的儒学范围。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子弟“渐知礼仪，以昭朝声教之盛”（《贵州通志》），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客观存在，迫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办学宗旨并未实现。地方官员一怪教师不好，“不能导人以善，转恐其相诱为非”，二怪学生愚顽，“欲其通晓《四书》义理甚难，而识字之后，以之习小说邪书则甚易，徒启奸匪之心，难收教化之效”。（民国《贵

州通志·学校志》），清政府认为，如果继续在少数民族地区办社学，“开其智巧，将必奸诈百出”（清《高宗实录》卷395），于封建统治不利，遂加以限制，裁汰教师，取消对少数民族子弟的加额优待，使他们难于进学，以达到“不禁而退”的目的。境内社学开办十余年，终于被认为违背办学宗旨，遭到废止。对于义学，也严加约束，学校均设在营、汛附近，置于军事控制范围之内，并责令文武官员随时稽查，以保证其办学宗旨的贯彻。

同一时期，各村寨的私塾也统一贯彻钦定的教育宗旨，课本是统一的蒙学书籍，对塾师的审查颇严，必经地方官吏或乡绅认可，才准开馆教学。在学校中绝对禁止偏离圣教，议论时政，否则以张扬邪说，图谋不轨论处。

清咸丰五年（1855年），境内各族人民起义，许多原在义学、私塾读过书的人，投入义军队伍，成为基督教的传播者，在义军控制区内，“念《五公经》，苗民竟相传诵”（《咸同军事史》）。人们抛开《四书》《五经》，去念《五公经》，封建的教育宗旨，在境内已显出严重危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境内于光绪三十三年停办合江书院，光绪三十四年办初等小学堂。这时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即在传统的宗旨内，增加部分新学旨趣。境内学堂少，乡间的儿童入学难，部分乡绅及富裕人家，固于传统思想，对新学惑疑，也有不愿送子弟进学堂的，农村仍以私塾为主，沿用古代的

教学方法，仅有个别地方加有珠算等实用课程，至于体操、劳作等向来不列入教育内容。钦定宗旨始终未能全面贯彻。

民国7年（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所讲的健全人格，包括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方面（见《蔡元培选集》第149页）。但境内兵焚水旱频繁，公私学校时办时停，小学沿用民初教制，私塾改良仅是空文。国定的教育宗旨仍未落实。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义务教育的《办法大纲》以三民主义为宗旨。境内于民国25年在小学设公民课，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德育的主要内容。

民国32年，三都县政府贯彻义务教育法，使用行政手段推行“强迫教育”，把国民学校增至80余所，学生增至5000余名（见民国档案）。并于民国33年成立三都县强迫入学委员会，县长兼主任委员。乡、保长兼国民学校校长，责令家长送子弟上学。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师资奇缺，一些保国民学校，虽办校挂牌，实际无法开课。至民国37年已难以为继，被迫退却，下令砍掉42所保国民学校，学生降到3000余名，又回到民国26年的水平。

1950年，三都县人民政府贯彻“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年元月，在县城举办训练班，根据“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组织原有34名小学教师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方针，使他们逐

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适应教育改革工作。这时缺新课本，只取消原有的训导制度和“公民”、“童子军”课程以及文科教材中反动的章节，其余课程不变，教师队伍也基本保持稳定。

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发《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贯彻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同年寒假期间，县人民政府组织全县小学教师60余名参加土改工作。使他们认清了长期在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农民缺少文化的痛苦。次年春季开学后，各校教员协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村寨动员各族农民子弟入学。这年各乡土改相继完成，农民经济条件好转，学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适龄和超龄学生明显增加。此外，各乡村也纷纷举办冬学，入学农民增至万余名。许多教师白天教小学，晚上教冬学。为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贡献力量。之后数年，政府采取在穷村、小村立公办小学，在富村、大村建民办小学的办法，使教育网点稳步在农村铺开。为兼顾农村中放牛、割草、砍柴、打猪菜等家庭劳动，一些学校实行隔日制、半日制、早班、午班等多种形式教学，深受农民欢迎。小学教育持续发展。

1957年，党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时，县内有学校104所，学生12855人，学校风纪和教学质量良好。

1958年，党中央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正值“大跃进”时期，县内贯彻这一方针时，不切实际地强调学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分区分片把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

按部队建制编班编排，在教师带领下，就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有的还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学生劳动频繁，教师被过多地抽调参加中心工作，正常教学秩序遭到冲击，教学质量下降。同年，贵州省教育厅提出要求，要在9月20日前普及小学教育，县内闻风而起，新办小学109所、工、农、林中学12所。学生人数激增到23000余名。教师奇缺，设备不敷使用，各校虽然因陋就简地开课，实际上，教学计划已无法完成。在大办学校的同时，全县性的扫盲活动也一轰而上，在33个乡办99所农民夜校，上报的入校人数达数万名，实系浮夸。多数夜校流于形式，并未收到实效。1959年，县内饥荒，农民夜校解散，许多学校亦处于半瘫痪状态。1960年，民办小学基本停课，公办小学实行调整合并，农村四年级以下超过16周岁的学生，全部动员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此后三年，进入调整时期，到1961年小学生下降到5700余名。

1963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即正规学校和半农半读学校两种教育并举，又叫“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之后，农村采取因地制宜、小型分散，形式多样的办学方法，每个大队都办学校，方便儿童就近入学。这种学校叫耕读学校。到1965年，全县耕读小学有200余所，加上公办学校共249所，学生人数恢复到16000余名。

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各校于同年秋季停课闹革命，到1970年3月复课，这时学校原有的规章制度已被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尚未恢复，教学质量显著下降。

1971年江青反党集团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两个估计”，完全否定建国17年的教育成就，说学校教师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影响所及，境内各学校师生的思想陷入混乱，强调阶级斗争，轻视文化科学，成为普遍现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实际上已不可能正确贯彻执行。

1974年，各区、社小学普遍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三都中学、三都师范则以国家建设局都匀六公司的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进驻并管理学校，后县硫磺厂工人所代替。到1975年8月，全县有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281个，工宣队2个，不脱产的管理委员1000余名。这些管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办学的方向路线。这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示设置的。到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组织停止活动，并无形消失。

1977年8月，在县城召开教育革命会议，有来自县内527所中小学的1511名教师参加。这次会议拨乱反正，批判“两个估计”，解除了套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锁，并表彰38个先进教学集体和244名先进教师。之后，三都县委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平反了教师中的冤、假、错案。为贯彻正确的教育方针奠定基础。

1980年，教育部在北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办法方针，必须坚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的原则。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者。并明确教育战线要抓好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集中力量

办好重点学校，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成人业余教育等项工作。同年县内针对自1974年以来，普通中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弊端，采取停、并、转措施。停办32个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将大河、普安、水龙、都江等四所完中调整为初级中学，停办巴佑初级中学。通过调整，使原来抽调任中学教师的150多名小学骨干教师，返回小学教学岗位，确保小学教学质量，同年三都中学、三都师范和三洞学校先后定为民族学校，并恢复水龙民族小学，发展上江、九阡两所民族小学。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同时，于小学领导班子中，抽出部分人员配备各区、社农民教育专业干部，在区一级增派成人教育视导员，抓扫盲工作，农村业余教育稳步开展。

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扶持三都县18个“瑶山式”地区，即边远少数民族穷困的落后地区的学校教育，有拉揽、尧吕、和平、阳基、高洞、地祥、塘州、上江、打鱼、介赖、巫不、羊福、甲雄、坝街、板甲、扬拱、恒丰、和勇等乡得到照顾，入学儿童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并给予困难补助。

1983年，在农村小学恢复一些五十年代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半日制、隔日制，早读班、午读班、识字班、简易班等，方便少数民族子女入学。同年为扩大农村少数民族女生入学率，在上江、中和、九阡等小学办女生寄宿班，有寄宿女生150名，均由学校与家长签订合同，并派本民族女教师管理和指导学生生活、刺绣、缝纫以及体育活动等。在教学方面，亦结合民族语言进行。

1985年，阳基、交梨、高洞等小学，开办3个苗文教学班，周章小学开办1个布依文教学班，到1986年，已有苗文教学班9个，360多人，布依文教学班2个，58人，并在三洞民族学校开水文试点班1个。

1986年，三都民族中学开初中女子班，有学生53名。

自1980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新明确的办学方针以来，民族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到1987年，县内有公办、民办小学368所，中等学校12所，在校学生3796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0%。但女生入学率仅占48.9%，一些边远小学没有女生入学的情况依然存在。普通中学结构单一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见三都水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起草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状况》）

第二节 学 制

一. 普通教育学制

明代烂土司长官学，详情无考。但地方文献并未把它列入“儒学”，可见它是与“社学”、“义学”同格的初级学校。同一时代的私塾，一般6至8岁为发蒙期，未规定修业年限。

清代学制沿袭明代旧制。雍正十年开办的都江厅义学，免费收15岁以下的学生，读初及学校无修业期限，但地方官吏考核学校的成绩，以6年为期（见乾隆《贵州通志》）。乾隆年间，三脚屯办的社学，入学年龄限在12岁至20岁之间，也无严格的修业期限。义学和社学的学

生中，成绩优良者，由地方官选送独山州或都匀府通过考试进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前，清政府在府学和州学设有苗子弟入学的加额。但境内办学条件差，进入州、府学十分困难。之后，连加额也取消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一体合考，择优录取。民族生的科举仕途，实际已被阻塞。

清道光以后，境内私塾有发展，入学年龄无严格限制，一般在6岁至20岁之间，修业期限不定，学生中进入仕途的百无一人。据地方文献记载，乾隆到道光年间，获贡生以上的人士仅19名（《三合县志略》）。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脚屯设合江书院，系私人出资兴办，是一种较高级的学校。收“秀才”或童生入学，年龄不限，也无修业年限，实际是准备应试的学府。请名师主讲，采用集众讲解、个别钻研、相互问答等形式，研究儒家经籍为主。与府、州、县学不同，学生没有国家津贴，也没有科举仕途的身份。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脚屯、都江等地的初级小学堂，按《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收7岁儿童入学，后放宽至9岁，修业以5年为限，毕业后可不经考试，升入高等小学堂。

民国3年，境内始有高等小学。这时按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令，初小4年，高小3年，入学年龄为6周岁至14周岁止。但因学生难得，14周岁以上的也收。初小毕业可直接进入高小，具有相当程度者，虽无初小毕业文凭亦可进入高小读书。

民国11年（1922年）公布壬戌学制，初小4年，高小2年之后，境内小学均执行这一学制。但在一般完小中，四年级学生直接升入高小五年级，初小不再有毕业阶段。

民国25年至29年，农村办短期小学，学制1—2年，儿童班修业2年，入学年龄仍为6周岁至14周岁，成人班修业1年，年龄不限，属于扫盲学校。

民国31年，普通小学、短期小学统改为国民学校，完小一般称中心小学，各保的短期小学改称保国民学校。中心小学仍是4—2制，与完小无异，保国民学校学制2年，入学年龄限在6—8周岁之间，但实际上因学生上学不易，6周岁至10余周岁都有。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学生，念完保民学校后，到中心小学插班就读，一般不经考试。

同年办中等教育，省立三都初级造纸职业学校及其附设的普通初中班，学制均为3年。学生来自小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入学年龄，职校限14周岁至20周岁，普通初中班，年龄限在12周岁至18周岁。但也收超龄生。

1950年，县人民政府贯彻“积累经验，逐步改革旧教育制度”。（《共同纲领》）的规定。沿用旧学制，小学修业年限6年，初中3年，入学年龄无新的规定。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小学实行一轨制，取消初高两级分教制，修业期限5年，入学年龄7—12周岁，毕业后，经考试升入普通中学或其它中等学校。境内

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沿用6年制直到1966年。但初小、高小仅是习惯称呼，无严格分段。小学6年，实际也是一贯制。

1960年，试行小学5年、中学5年的10年一贯制。选三合小学为试点，于同年秋季招收一年级两个班试行，到1963年秋，试点班改为普通班，试点中断，未在全县推广。

1970年3月，县内学校复课（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课7学期），小学改为5年制，中学改为4年制（高中2年，初中2年）。当时尚无这一学制的统编教材，由各校对原有教本自行压缩施教。在具体执行中，各中学的学制仍不统一。

1972年，贵州省遵照中央1971年“关于中学学制暂不统一规定，各地可以继续按当地情况进行试验”的指示。县内明确1972年秋季中学招生，初中学制3年，高中学制2年。

1981年，小学恢复6年制。

1982年，高中恢复3年制。至此，县内普通教育学制为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执行至今。

二. 业余教育学制

民国时期县城民众教育识字班，每期2至3月，联保民众教育识字班，每期2月。教育对象为成人，无年龄限制。

1951年开办农村冬学，每期2至3月不等。

1952年至1958年，办民校，半年一期，学员就学的期数不限，以脱盲为止。

1954年，县城办政治文化学校，以职工为教育对象，半年一期。但因生产忙或政治活动频繁，时断时续，未能贯彻始终。

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村民校、夜校一律改为“红专学校”，吸收已脱盲的青年参加，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学制一年半，要求达到高小毕业水平，并具备一般农业生产知识，毕业后升入红专中学，即农业中学、林业中学和工业中学等。但不到一年，经济形势恶化，即行停办。

1974年，农村开办政治夜校，以政治宣传文娱活动与文化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办学，无学制规定，也无系统教材和考核制度，多流于形式。

1980年，恢复农村扫盲活动，办农民夜校，分为扫盲班和业余小学班。学员年龄为13岁至40岁。扫盲班学习年限不定，以扫除文盲为目的。业余小学班以脱盲的少、青、壮年为教育对象，每周学习4晚，每晚2小时，学制17个月。至今仍在贯彻执行。

1983年，县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开办职工文化文学班，学员为县城附近的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年龄为18周岁至35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实际小学程度的也收。学制无定，最短2月，最长6月。

三. 专业教育学制

师范学校

民国24年，三合女子小学开办简师班，学制2年，学生来源主要是女校高小毕业生。